

刘歆与《诗序》

张 燕 婴

《诗序》即《毛诗序》的简称。^①历来对于《诗序》结构的划分有所谓的“大序”“小序”(郑玄《诗谱序》^②)、“古序”“宏序”(程大昌《考古编》卷二“诗论十”^③)、“前序”(《二程遗书》卷二上)、“后序”(范家相《诗沈》卷三“关雎”条)、“首序”(郝敬《毛诗原解序》)、“续序”(龚橙《诗本谊》“卷耳”条)、“下序”(《六经奥论》卷三“诗序辨”条^④)等称谓,究其所以命名,多出于持论者的已定观念,难免庞杂难明。本文的讨论将放弃这些成说,希望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序说与各家诗说的关系,从而探究《诗序》的“著作权”归属问题。

一.《诗序》为西汉时作品

首先可以认定的是:《诗序》的最后写定肯定在三国之前。《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诗序”条云:“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唯黄初四年^⑤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此说正用《曹风·候人》之序“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语。

其次,《诗序》晚成于《毛传》。今本《诗序》之说与《毛传》相抵牾的诗篇,据笔者统计有44篇之多,其中《周南》3篇(葛覃、芣苢、汉广);《召南》6篇(鹊巢、草虫、采蘋、羔羊、鵲有梅、小星);《邶风》2篇(凯风、静女);《鄘风》1篇(君子偕老);《卫风》3篇(硕人、竹竿、木瓜);《王风》2篇(君子阳阳、兔爰);《郑风》5篇(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蔣兮、出其东门、野有蔓草);《齐风》1篇(东方之日);《魏风》2篇

(葛屨、十亩之间);《唐风》3篇(蟋蟀、绸缪、有杕之杜);《秦风》2篇(晨风、无衣);《陈风》3篇(宛丘、东门之杨、泽陂);《曹风》1篇(鸛鸣);《豳风》2篇(伐柯、狼跋);《小雅》8篇(四牡、皇皇者华、伐木、鱼丽、湛露、吉日、鸿雁、车辇)^⑥。序、传解说诗旨存在如此多的不符,正说明《诗序》与《毛传》绝非同一作者,同时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毛公传诗时未见《诗序》,《诗序》不是毛公之前作品,也并非毛公自作,而是毛公身后儒生的杰作。

《诗序》的定本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凭空臆造,只能是在传统说诗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最终才写成一部完整的定本。《诗经》在春秋战国时代,被赋予极强的政治教化功能,人们在日常生活、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往往称引《诗》中的辞句来表达某种愿望、要求或态度,这就是所谓“赋诗言志”。因此,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众多记载当时史事的典籍里保存了人们引诗、赋诗、说诗的资料,它们正可以作为研究《诗序》生成年代的珍贵线索。笔者通过对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引诗、用诗资料的分析研究,比较它们与《诗序》的异同,得出如下认识:

记载春秋战国间言与事的传世典籍中,引用了《诗经》篇章字句的颇多。如《晏子春秋》引诗19篇;《左传》所记赋诗53篇,引诗84篇,两项合计而去其重,共123篇^⑦;《国语》引诗31条;《尚书》引诗17处;《礼记》用诗70篇;《孟子》用诗34篇;《荀子》用诗76篇等。在如此众多的诗说资料中,笔者搜集到的与今本《诗序》相同或类似的文字不过42例。^⑧分布情况如右表所示(其中间有重复者):

这一点可以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一部定本的《诗序》;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晚出的《诗序》对春秋战国时代诗说的继承之功。

春秋时代的诗说反映的主要还是周代国子学声义并重、声义并教的诗歌教授方法和由简入繁的诗歌教授过程。^⑨而战国时代用诗显然已经完全抛弃了“《诗》以声为用”的功能,更多地关注其

先秦典籍	《诗经》篇名
《晏子春秋》 ^⑨ (2 篇)	《宾之初筵》(《小雅》),《棫樸》(《大雅》)
《左传》(24 篇)	《甘棠》《摽有梅》(《召南》),《桑中》《鶉之奔奔》《相鼠》 《载驰》(《邶风》),《硕人》《木瓜》(《卫风》),《缁衣》《清人》 (《郑风》),《蟋蟀》(《唐风》),《黄鸟》(《秦风》),《墓门》 (《陈风》),《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南山有台》 《湛露》《彤弓》《吉日》(《小雅》),《行苇》《洞酌》 《桑柔》(《大雅》)
《国语》(7 篇)	《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小雅》),《抑》《桑柔》 (《大雅》),《那》(《商颂》)
《尚书》 ^⑩ (1 篇)	《鸛鸣》(《豳风》)
《礼记》 ^⑪ (5 篇)	《关雎》(《周南》),《采芣》《采蘋》(《召南》),《伐柯》 (《豳风》),《都人士》(《小雅》)
《周礼》(2 篇)	《关雎》(《周南》),《蒹葭》(《秦风》)
《孟子》(4 篇)	《柏舟》《凯风》(《邶风》),《北山》(《小雅》),《灵台》 (《大雅》)
《荀子》(4 篇)	《柏舟》(《邶风》),《鱼丽》《鹤鸣》《无将大车》(《小雅》)

中的义^⑬。虽然用诗者往往是将自己之意强加在《诗》义中,得到的认识也常常并非《诗》之本义,但这并不影响后人对他们用诗方式的继承,他们的诗说甚至最终固定为标准解释。这种方式对汉人的影响就是:“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⑭。尽管这种“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的说诗方式战国间人就已广泛采用了,但“一律”用此法解诗,最终写定整部《诗序》的工作却是汉人完成的。

考查历代典籍记载的《诗序》作者,刘歆、卫宏是汉代人。^⑮笔者则以为序成于卫宏之说不确,原因有二:

其一,《后汉书·儒林传》说:“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据此可知,卫宏曾治《诗》《书》,于《左传》却没有什么研究。然依笔者上文的分析,

《诗序》言诗多与《左传》记载之历史事件合；其谬误之处尤其是如此：如《新台》之刺卫宣公纳伋之妻、《墙有茨》之以公子顽通乎君母^⑥。《关雎序》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各序也以美刺为说。卫宏不曾治《左传》，而作序者却精通《左传》；卫宏不曾治《春秋》，而作序者却如春秋家一样，喜言褒贬美刺。以为卫宏作序，于此有所不通。

其二，据《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受《古文尚书》。序如果为卫宏所作，则其杂取传记，当多本于《尚书》。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序说所取用，除《左传》外，《国语》、《礼记》为多；采用孟子、荀子之说亦不少；而“诗有六义”出于《周官》，《蒹葭序》言“未能用《周礼》”。只有《鸛鸣》一序，本于《尚书·金縢》。以为卫宏作序，于此理又不通。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十以为：“此三家全经，并以序各冠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同时亦著录有“《毛诗》二十九卷”，这是一个“以《序》别为一卷，次于二十八卷之后”（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陈奂《诗毛氏传疏序》及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十，说同此）的本子。可见，刘歆作《七略》时^⑦，《毛诗》已经有序。

依上文的分析，笔者把《诗序》的写定时间下限确定为西汉朝，写定之人精通《左传》、《国语》、《晏子春秋》等史书，又有机会目睹《礼记》、《孟子》、《荀子》等儒家后学载籍，他依托、化用或变通上述作品中的说诗资料完成了全本《诗序》。

二.《诗序》为刘歆写定

前人论及刘歆与《诗序》关系的只有康有为一入，他在《新学伪经考》卷九中称：“《毛诗》伪作于歆，……序作于宏，……然首句实为歆作，以其与《左传》相合也；宏序盖续广歆意。”尽管如此，康氏仍然将《诗序》离析来看。笔者仔细分析了每篇序文和整部《诗序》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单篇序文气脉贯通、前后呼应^⑧；前后各篇之间亦十分注意相互关照、主张一致，明显是一人手定。同时，《诗序》采先秦诗说，还有综合各书成说的特点，如《关雎》兼用《周礼》、

《礼记》之说；《采芣》、《采蘋》、《缁衣》则兼采《左传》、《礼记》而成；《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桑柔》融合《左传》、《国语》成说，等等；甚至有些篇什还兼采今古文学说^①。

能做到贯通先秦学术的人，在西汉朝屈指可数。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儒林传》等的记载，西汉朝的经学家多专守一经，鲜有兼通数门的鸿儒大家^②；且今古文经学间的学术壁垒相当森严，不得逾越。直到西汉末年才逐渐出现了兼通的经师，此人就是刘歆^③。此外，在刘歆父子校书之前，无人有幸得睹如此众多的先秦载籍。汉朝初年，古文献的搜求整理工作尚处于自流、分散的状态；至武帝时才“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此才有可能开始有组织的整理。但史迁作《史记》时古文经书尚不完备：他只见过《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和古文《论语》^④，不见《毛诗》和《周官》。身为史官的司马迁尚无缘遍见天下载籍，何况他人？其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汉书·成帝纪》），古书纷纷出现。于是成、哀之际，旧籍齐备，始具规模，这是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理群书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刘氏父子学问渊博，涉猎极广^⑤，尤其是他们在整理、挖掘和保存先秦经籍方面的杰出贡献，就其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而言，在有汉一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就以上文分析过的《诗序》征引诗说最多的几部典籍为例来看它们的承传经历。

1.《左传》

刘歆于《春秋》学的贡献在于：“歆略从（尹）咸及丞相翟方进受（《左氏》），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左传》经过刘歆与尹咸的“共校”，不再是原本。^⑥诚如金春峰先生所说，刘歆“使《左传》这一古文书籍今学化”^⑦，也就是说，刘歆在《春秋》之古文《左氏》学中，杂糅进了今文家之说，

以期融合古、今两派的学术思想，而成一家之言。然而，金先生却说刘歆“完全是一今文经学家”^⑥，似不妥当，自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尖锐抨击今文博士的狭隘为证，姑不论列。

2.《礼记》

《隋书·经籍志》述《礼记》源流时说：“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由此可知，在刘向校书之前，《礼记》尚无传者^⑦。因而，不可能有人在校书之前采撷该书中的诗说资料写成系统完备的若干篇《诗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乐记》23篇是在刘向校书时被搜集起来，并将其中11篇并入《礼记》传世的。

3.《周礼》

《隋书·经籍志》载该书来源为：“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这是古文学家的观点，今文家则以为《周官》是刘歆伪作的^⑧。事实上《周礼》一书产生于战国时期，其作非一人手笔。汉武帝时由河间献王进呈府库，深藏而不为人知。直到成帝时向、歆父子校理秘书，才名以《周官》，著于《别录》、《七略》。平帝中王莽执政，更其名为《周礼》，并立于学官。由该书的兴废史，可知刘歆所起的重要作用。

4.《国语》

《国语》一书的承传者，《史记》不载；而《汉志》著录为：“《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显然，是刘向使这部深藏于秘府的《国语》终为天下人知晓。

5.《荀子》

荀子的著作流传到西汉，曾经过刘向的整理校定。刘向《孙卿新书叙录》记录此事：“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

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中”，指当时皇家的藏书。荀子书经过秦火，在民间已罕有收藏，惟有宫中可见。正是刘向从中央收藏的322篇《孙卿书》中校定出一部有32篇文章的《孙卿新书》，才使这部书能够重见天日。

试想，在汉代如果不是政府任命的校书者，谁有可能遍览深藏宫中的典籍？谁能有工夫从一些在当时尚未受到官方推崇、也决非圣贤作品的书籍中，逐一清理抽绎出系统完备的说《诗》资料？而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载籍的传世，或直接或间接地都与刘歆有关，据此笔者推定刘歆是《诗序》的著作者。同时他向皇帝请立古文经时，手中掌握的《毛诗》古文经书必然是完备的：不仅训释了诗文词句，也解说了全篇主旨，否则其本身的简省晦涩就无法与今文经体系完备的学说相抗衡^⑨。既然三家诗早已确立了各自的说解系统，且各自有序或有相当于序说的文字，刘歆请立的《毛诗》就不可能缺少《诗序》，因为只有《诗序》才是集中反映《诗》学理论架构的部分，能使《毛诗》真正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此外，了解古籍体例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刘歆写定《诗序》之事。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云：“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对此说，余嘉锡先生解释为：“按《汉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然则汉初非无全诗也。然而或为《雅》，或为《颂》者，遗经初传，学者不能通其义，则各就己之所长，性之所近，取其一部分诵习之也，古人读书盖多如此。因其时竹帛繁重，抄写不易，往往因某事欲读某篇，则只抄取此一篇观之。”（《古书通例》卷三）^⑩由此我们亦可推测，即或《毛诗》在汉初是有全本白文的，传授《毛诗》的经师首先要解决的显然是识读“古文”的问题^⑪，尚未遑于对其主旨进行研究，因此《诗序》不可能是那时形成定本的。到向、歆父子校

书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天下典籍俱在他们眼前，则他们完成一部完整的《诗序》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周、秦、两汉之际，著书人无自题姓名的习惯^②。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人没有后人的“著作权”观念；另一方面“著作权”的不清，也更方便他们将自己的言论依托为圣人的言论，以求提升其说的权威性，使之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③。此外，当时竹帛是主要书写材料，简牍笨重，帛书珍贵，世人传习学术必然有所选择；而圣人的言谈论述生来就具有更高的号召力，更容易被人们奉为圭臬。这种“托古取重”的做法到魏晋间仍不绝于缕^④。《诗序》也是这样，《汉书·艺文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其中将《毛诗》托为“子夏所传”正是出于借圣人立言的考虑。虽然其中没有明言序亦为“子夏所传”，但今本《诗序》逐篇散见于《毛传》前，让人逐渐产生了误会：以为《诗序》就是《毛诗》的一个部分，自然也就把它归为是子夏的传本了。《汉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的，则是说为刘歆之托无疑。上文引述过《汉志》著录的《诗经》今古文各家的卷数、体例，两者殊为不同，笔者以为这恰恰提示我们《毛诗》之序显然不是其原本所固有的。而这两条著录其实就是刘歆自撰《诗序》的线索，他当时之所以如此记载，大概是为了在发生学术争执时给自己留下退路，惟恐异派学者以为他妄造经书。惜今文学家抱守门户之见而“不考情实”，没能发现个中蹊跷，而吾先人亦不能明察于此。

还有一条很明显的证据来自《诗序》本身，《诗·小雅》中六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之序皆云：“有其义而亡其辞”，这根本就是校勘术语。正是刘歆承其父遗业，最终完成了校理群书的工作，那么他就最有可能在校书的同时参阅众多中央藏书，逐条记载下他的读《诗》心得，看到这些有目无辞的诗篇，他则写下了这些校勘家常用的文字。因此说刘歆写定序文，也就并非奇谈怪论了。

最后还想指出一点，本文之称“刘歆写定《诗序》”是有特定含义的：笔者以为，先秦、西汉间的诸多诗说是古人们不自觉地“写”《诗序》，“写”在周、秦、西汉间成书的典籍里，“写”在可考的，或者当时尚存、如今已不可考的赋诗、诵诗、引诗、歌诗、作诗的记载中；待到刘歆校书，他就是自觉地写《诗序》了。总之，笔者以为刘歆校理中秘藏书，他有机会比一般人看到更多的古籍，有机会更为确切地征引古书中的文辞；于是刘歆得以在此基础上把散见于众多古籍中的诗说资料汇总起来，“写定”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诗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种著作形式命名为“著”，就像我们今天愿意称《战国策》为刘向“著”一样^⑤。

根据本文的论述不难看出，《诗序》中的解诗思路是有所承传的，但以同样的思路遍解《三百篇》，终成一部完整的《诗序》，却是刘歆完成的。因此笔者以为《诗序》这部体大精深的《诗经》学论“著”，是刘歆于两千余年前奉献给吾人的思想瑰宝。刘歆享有《诗序》的“著作权”是当之无愧的。

注：

①传统观念认为汉代古文版本的《诗经》即《毛诗》有序，而今文本的三家《诗》无序，所以简称《毛诗序》为《诗序》。实际情况则是：“韩诗”有序，已为陈乔枬纂集之《韩诗遗说考》所证实；“鲁诗”“齐诗”是否有序虽未有定论，但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称引，至少可以看到此二家对于各诗篇主旨的发明之说，虽未必即为成型之序，然亦不出其左右。

②对于郑玄的划分，陆德明《经典释文》注云：“旧说云：起此（笔者按：指‘《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曰：“世以《序》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郑谱》所谓‘大序’，今所谓‘小序’也；所谓‘小序’，今所谓‘大序’也。”同样的分法，命名却正相反，显然有企图陷人于糊涂的嫌疑。而陆德明早就说过“此序止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是他已放弃了此种分法。

③此划分显然已将《诗序》的作成有历时性的特点作为前提，又将《诗序》成于卫宏的假设作为定论。

④关于《六经奥论》一书的著者，顾颉刚先生以为：“是书始刻于明，题郑樵著。朱彝尊《经义考》、全祖望《鲒埼亭集》及《四库提要》皆疑之。……予假定：郑氏作《诸经考》，及身未刻，身后为习举子业者所利用，窜易增删为《六经雅言图辨》，以其原本郑氏，故题‘莆阳二郑先生’；又经车似庆之改编，遂为《六经奥论》”。（《六经奥论选录》“顾颉刚案语”，顾颉刚所辑《诗辨妄》附录三，朴社出版，民国22[1933]年）

⑤魏文帝曹丕的年号。

⑥笔者另有专文详细分析这些诗篇。

⑦朱自清先生统计，见《诗言志辨》第62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

⑧笔者另有专文详细分析这些诗篇。

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穴中出土了《晏子》残简，今本八篇皆有发现，据此可以肯定它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又以书中文气来看，它没有战国间诸子作品的铺张扬厉；其地名、风俗、方言等特点系出齐人；称史事多扬田氏，且预言田氏将代齐，由此推断该书可能成于田氏代齐（公元前481年）后不久。

⑩见《尚书·金縢》篇。曹道衡先生以为：“《周书·金縢》颇有些小说的意味，恐怕产生年代较晚，出于战国人之手。”（《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⑪《礼记》是一部不同类型的文章和资料的汇编性文献，其中各篇虽写成年代不一，但多数篇什系出战国间儒生之手，此说已成定论。

⑫说参章必功：《“六诗”探故》，《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84年。

⑬朱自清说：“孔子时代，《诗》与乐开始在分家。从前是《诗》以声为用；孔子论《诗》才偏重在《诗》义上去。到了孟子，《诗》与乐已完全分了家，他论《诗》便简直以义为用了。从荀子起直到汉人的引《诗》，也都继承这个传统，以义为用。”（《诗言志辨》第119页）

⑭《诗言志辨》第62页。

⑮也有认为是“毛萇以下弟子所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序》），或统称为“小序为出于汉儒”（朱熹《诗序（辨说）》卷上）的。

⑯说详《诗沈》卷五、卷六，《读风偶识》卷二。

⑮《汉志》在《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成。

⑯如崔述《读风偶识》卷一“通论诗序”说：“（《关雎序》）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至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则’字为转语。若于诗之‘至也’画断，则此文上无所承，而‘然则’云云者，于文义不可通矣。”以文气之贯通破历来序分大小之说，又是一人定序之力证。

⑰笔者另有专文申明这些观点。

⑱清人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辑录西汉博士112人，仅有后苍一人以《诗》、《礼》两学同立为博士，其他或为某一专经博士，或为“杂博士”（指那些不详其授受为何书、何人的学者）。而据笔者的统计，申公兼通《诗》、《春秋》（《汉书·儒林传》），韩婴兼通《诗》、《易》（《汉书·儒林传》），孟卿兼通《礼》、《春秋》（《汉书·儒林传》），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汉书》本传）。即使是这些儒者，他们所通之经，也都仅限于今文学。

⑲皮锡瑞《经学通论·书经通论》说：“当时所谓通儒刘歆、杨雄、杜林、卫宏、贾逵、许慎以及马郑”云云，正是将刘歆作为两汉间通儒之第一人。

⑳《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仲尼弟子列传》“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㉑《汉书·楚元王传》云：“向……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又云：“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官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㉒说详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

㉓㉔《汉代思想史》第4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㉕王梦鸥说：“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开始讲《礼记》。”（《礼记今注今译》第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则《礼记》一书为人普遍重视是很晚的事。

㉖说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六。

㉗《毛传》解诗的一般情况是只训释其中个别词句，而较少涉及整篇诗的大旨，据笔者统计这种状况约占80%以上。

③⑩1977年8月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现写成于西汉文帝15年(前165)之前的简本《诗经》残卷,经整理后知有《国风》(除《桧风》外其他十四国风均有残存)残诗六十五篇和《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四首残句,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余先生的说法。

③⑪古文虽为战国间六国所使用的文字,然因其中俗体字的大量存在,发展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对秦国篆文所继承的商周正体字有很大的突破,被汉代人误认为是一种早于大篆的字体,并以“古文”命名之。

③⑫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卷一总结为:“古书不题撰人”。

③⑬对两汉及以前学者而言,其言“行而不远”是他们最担忧的,于是为了学说的远扬,他们是不惮于“作伪”的。

③⑭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托名孔子门徒的《孔子家语》及托名孔鲋的《孔丛子》,都是魏晋人的伪作。

③⑮《全汉文·战国策书录》:“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莠。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

[唐]长孙无忌:《隋书·经籍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

[宋]朱熹:《诗序(辨说)》,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宋]程大昌:《考古编》,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9年版。

[宋]郑樵:《六经奥论》,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明]郝敬:《毛诗原解》,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91年版。

[清]范家相:《诗沈》,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清]崔述:《读风偶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60年版。

[清]龚橙:《诗本谊》,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1995年版。

[清]陈寿祺、陈乔枏:《三家诗遗说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1995年版。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中国书店1984年据漱芳斋1851年版影印。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本1987年版。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1995年版。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1995年版。

[清]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6月版。

[清]严可均:《全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

[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

顾颉刚辑:《诗辨妄》,朴社出版,民国22[1933]年版。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

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华书局1985年版。

朱自清:《诗言志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章必功:《“六诗”探故》,《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